

中国大众传媒
新闻故事丛书



全中国都在倾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的故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著
杨波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中国都在倾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故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著. -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2
(中国大众传媒新闻故事丛书)

ISBN 7-5043-3463-4

I. 全… II. 中… III. 新闻特写-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65 号

I253.4
ZRG

全中国都在倾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故事

主 编：	杨 波
责任编辑：	黄道京 牟国栋
装帧设计：	郭运娟
责任校对：	谭 霞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2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17.625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5043-3463-4/G·1322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 前言 安景林 (1)
- 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诞生记 傅英豪 (1)
- 在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日子里 温济泽 (9)
- 陕北台杂忆 钱家楣 (33)
- 我干广播从这里起步 陈 寰 (44)
- 进城前后的广播电台 康 普 (52)
- “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了!” 杨兆麟 (62)
- 回忆“开国大典”实况广播 杨兆麟 (68)
- 周恩来总理心系广播 齐 越 (73)
- 在采访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岁月里 陈 寰 (78)
- 小记者与大领导 刘振敏 (99)
- 采访小平同志外事活动二三事 刘振英 (117)
- 三张照片的故事 刘振英 (121)

- 公开广播毛主席逝世的幕后故事 杨正泉 (126)
-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 杨正泉 (154)
- 采访张学良追忆 王 求 (171)
- 跟随班禅大师纪事 旺 堆 (177)
- 钱学森与科普广播 宋广礼 (185)
- 采访孔繁森纪实 崔世杰 (190)
- 报道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戚庆莲 (200)
- 一封听众来信激起的波澜 罗弘道 (208)
-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采访记 袁冰西 (218)
- 我参与的一次“澳星”发射实况转播 陆 洋 (229)
-
- 《午间半小时》的里里外外 万 梅 (240)
- 心中的《祖国各地》 黄传惕 (254)
- 《新闻纵横》编辑室的故事 孟 昕 (261)
- 部长热线引发的事件 周 军 (270)
- 《小喇叭》特别节目《五星红旗 50 年》杂记
..... 王成玉 (276)
- 《奇思妙想》栏目的“奇思妙想”
..... 覃 勇 程 显 (285)
- 《美国音乐一小时》的由来 张冬兴 (291)
- 少年儿童广播剧团的诞生 果 青 (299)
- 《我的父亲邓小平》创下中国广播史上覆盖面之最
..... 叶咏梅 (306)
- 体育广播——我热爱的事业 张 之 (311)
-
- 和将军一起下连当兵 何 松 (321)

我的西藏之行	沈如峰 (328)
雷锋使我成为一名军人	张雨生 (334)
我新闻生涯中的几个“第一次”	曹仁义 (340)
一首诗的诞生	黄传惕 (348)
一本旧《稿选》引发的回忆	吴志高 (355)
在南极的六十个日日夜夜	陶葆发 (361)
登山采访	张小平 (370)
电影《少林寺》录音剪辑引发的故事	熊永立 (384)
我为《民族大家庭》节目当播音主持	铁 城 (389)
重访长征路	张永泰 (394)
从播音员到主持人	雅 坤 (401)
《空中之友》之恋	冬 艳 (408)
缘	刘聪玲 (421)
我的矿工朋友	刘志生 (430)
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永远的朋友	叶咏梅 (437)
记者的故事	杜昌华 (448)
几次难忘的采访	汪永晨 (459)
酸甜苦辣记者尝	周绍成 (473)
南沙群岛采访手记	何端端 (482)
在与王洛宾交往的那些岁月里	吴朝晖 (492)
我为“妈祖出巡台湾”送行	盛志耘 (504)
随海军舰艇编队出访记	张朴宽 (511)
雪域之旅	曾晓东 (527)
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	张 彬 (541)
后记	(547)



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诞生记

傅英豪

1940年的一个秋夜。

从那一排排错落不齐的窑洞里，透出来的灯光愈来愈稀少了，延安度过了紧张的一天，渐渐地进入了梦乡。可是就在这时，王皮湾的一孔石窑洞里，通信兵的战士们正围着一部机器进行着最后一次试验。汗水从同志们的额角渗出来，就像窑洞石壁上的水珠一样，在煤油灯光下晶晶闪闪。片刻，人们轻轻地吁口气，立起身来，只听得电源组组长苟在尚同志说了一声“开动”，机器立刻呜呜地转动起来，同志们几乎是同声叫着：“行啦！”几个月来我们焦急地期待着的发电设备终于装制成功了。明天，它将为我们党的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开始供电了，大家的情绪随着机器的转动欢腾起来。

我们党虽然早就有了用无线电报发出的文字广播，但是还不曾有过语言广播，因此党中央非常重视语言广播电台的建设。周恩来副主席从苏联养病回来时，克服了运输中的各种困难，带回了苏联制造的一部无线电广播机。于是，这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的安装任务就交给了我们。

我们这群工作人员中，无论是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或者是久经征战的红军战士，谁都没有安装广播电台的经验。但同志们却有一片雄心壮志。接受到这个任务，人人都兴奋异常，立即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定要使这部机器迅速发音，让党的声音传遍四方。”要让电台发音，首先就要解决动力问题。当时延安正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包围和封锁中，根本不可能得到一部现成的发动机。因此我们只好要来了一部坏汽车头，边拆修边学习，把它改造成电台需要的发动机。没有汽油做燃料，同志们就用木炭产生煤气来代替。木炭怎样烧才能得到需要的煤气，煤气又怎样使汽车头发动起来，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全是新问题。但是依靠党的领导和集体的智慧，终于把这些难题一一解决了。

面对着已经调整好的广播机，我的心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想起了来延安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的那段日子。那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到的不是露骨的反动宣传，就是麻醉人民革命斗志的靡靡之音。我们几个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不知发过多少感慨：“什么时候，一扭开收音机，能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就好了！”现在，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从今后，我们这部红色电台，将成为新华社文字广播台的一个兄弟，它们将相互配合在一起，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传播根据地内军民在敌后坚持斗争的真实情况。不管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有多大的本领，挖多少封锁沟，筑多少封锁墙，他们都无法阻止我们的红色电波飞出延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同志们就起床，喧嚷嚷嚷，像准备参加什么庆典似的，从同志们一双双发红的眼睛里可以看



出，这一夜同志们和我一样，兴奋得没有好好入睡。播音员徐瑞璋和姚雯很早就来到播音室，再一次收拾那个实在没有什么好收拾的工作环境。我们的播音室，是一孔新挖好的土窑洞，一走进去还可以嗅到新土的芳香；拱形的窑洞内壁和门口挂着深灰色的军毯（这是当时边区生产的质量最好的羊毛毯），用来隔绝从远处传来的鸡鸣犬吠和消除洞内的回音。窑洞里只放着一张白木桌子和一条板凳，桌上的麦克风虽然很旧，却被擦得一尘不染。

吃过早饭，文字广播台报务主任汤翰璋同志兴奋地来到播音室门前。他特地穿了一套干净、整齐的灰军服，背着一部自己装制的小型无线电话机，大块的干电池把军装下方的大口袋挤得鼓鼓的，俨然像一个就要开赴火线的全副武装的战士。他是为了使电台及时知道试播的效果，被派出去收听情况的。当他那精神抖擞的背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电台开始了试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播音员反复呼叫着，然后用洪亮悦耳的声音读着报纸上的一篇短文。我们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收听者发回的报告。

“我在裴庄，声音很好。”突然传来了老汤的声音。

声音传出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隔不多久，又听到了老汤从无线电话机里传来了洪亮的声音，“我已到杨家岭附近啦！声音清楚得很！”从声音里可以感觉到老汤的那股高兴劲儿。我们在电台的人一听到杨家岭这三个字，个个喜形于色，因为杨家岭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常来住的地方啊！“要是毛主席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一定会听到我们的播音呢！”有的人竟在麦克风旁边轻轻地说出来。我心里

激动地想，等我们试播全部成功后，说不定还能请毛主席到电台来向各个根据地的军民、向全国人民讲话哩！

老汤离广播电台愈来愈远，而我们的播音他始终都听得很清楚。当天从安塞那边传来消息说，那边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

我们向各个根据地搜集反映。打电报问离延安较近的晋西北各电台，想不到那里的回电说没听到，有的电台说只偶尔听到一两个字，很不清楚。大家多么希望无线电波像一根从延安射出的红线，把党中央以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同各个根据地的军民紧紧地联在一起。调配组的唐旦等同志和我反复检查了机器和天线，把我们认为可能造成的收听障碍全都消除了，各个根据地回电说仍然听不到或听不清楚。试播工作就这样被卡住了。

大家的心情开始焦急起来。就连一向爱唱爱跳、性情非常活泼的播音员小徐和小姚也突然变得沉闷了。一年前，这两个江苏姑娘像许许多多的青年一样，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到延安。她们原希望到前线去做宣传员的。延大毕业后，却被留下做了播音员。她们知道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很愉快地接受了。而且觉得，凭着自己的革命热情和清楚流利的口齿，也一定能够在人民广播事业中做出一番成绩来。她们在试播工作中是那么认真，一篇稿子播送前总要经过反复的揣摩和预播，生怕表达不出原稿的感情。在业余时间，除了参加种地、纺线等劳动以外，一有空就钻研业务；为了矫正某些汉字的发音，电台仅有的那本小字典快要被她们翻烂了。可是时间过了这么久，广播来，广播去，各根据地竟听不到她们的声音。辛勤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收获，她们更是十



分心焦。

党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一直关心着试播工作的进展情况。邓发同志曾专门到电台来视察，他鼓励我们不要被困难吓住，不要乱闯蛮干，要发挥集体的智慧，根据科学道理逐步进行试验。我们根据电波传播理论，意识到问题的产生可能和电波的波长选用不当有关。那末要用什么样的波长才能克服某些地方收听不到的障碍呢？文字广播电台的同志们提出，可以做这样一个试验：把这部语言广播电台调到文字广播电台所用的波长上拍发新闻电报，看看各根据地新华分社的电台能不能听到。试验的结果，各个根据地的电台都给了回电，说听得和往常一样好。我们就进一步在这个波长上进行语言试播。

这天，我在广播机旁掌握机器的调整，让汤翰璋同志在报房里守着收报机，及时收听各根据地的反映。这时大家仿佛成了等候发榜的考生，既感到有一定的把握，又担心可能遭到意外的失败，心情非常紧张。一会儿，我旁边的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了汤翰璋激动而有点不连贯的声音，第一句就是“队长，问题解决啦！”接着他告诉我，晋察冀、晋东南、山东、晋西北都先后发来电报，说播音员的音质清晰、音量良好。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喜得跳起来。几个月的辛勤劳动终于结出了果实。从这回试验中，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集体智慧的巨大力量。

我们的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从此开始了每天定时的播音。不但播送新闻和报纸上的重要文章，而且还播送“文艺节目”。一开始，电台连一部唱机都没有，所谓文艺节目，常常就是播音员对着麦克风唱几支革命歌曲。不久，弄到了

一部破旧的手摇式唱机。但因为边区没有条件制唱片，而从国民党统治区买来的片子内容健康的又不多，所以放来放去，总是《义勇军进行曲》等几张片子。后来，我们便请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来演播《黄河大合唱》等节目。他们的大队人马一来，常把小小的窑洞挤得水泄不通。

为了保证电台的正常播音，通信战士们在接踵而来的多种技术问题上刻苦地钻研着。女调配员徐路在窑洞里长时间值班，被发动机煤管漏出来的煤气熏倒了。等到同志们把她抬到窑洞外救醒，她又立刻跑回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进行未完成的试验。后来当机器上某个重要的电子管失效而又没有备用品更换的时候，我们在党和上级的鼓励下，又拆掉原机器的部分结构，重新改装，终于利用了手头现有的电子管使电台继续工作。

1941年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新华社的通讯员骑马来到电台，送来了当天的广播稿。从通讯员紧张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今天准有重要的文章需要广播。打开稿件，我的眼前跳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一行大字。这是党中央就皖南事变发表的重要谈话啊！我立刻打电话给播音员，告诉她们今天有特别重要的文件要播，同时急切地读起来。几天以前，我们在报纸上就读到了国民党亲日派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的消息。看了这篇谈话对于日寇和国民党亲日派丑恶面目的揭露，就更加使我义愤填膺；而当读到谈话对于国内外进步力量的精辟分析的时候，我又对于阻止敌人阴谋的实现增加了百倍信心。我放下稿件，思绪又回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大后方”。那里的各种反动宣传机器，一定配合着这次反共事变，对我党我军



极尽造谣污蔑，可是今天，我们不但可以通过自己的通讯社、报纸，而且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广播电台，对敌人的反动宣传予以有力的回击了。

我把广播稿件交给了小徐和小姚，她们连晚饭也没有心思吃了，早早地进了播音室，点上小油灯，轻轻地放下挂在窑洞门口的毛毯，然后走到麦克风前，静静地坐在那里。播音时间一到，小徐打开麦克风开关，作了几分钟的呼叫以后，开始播送毛主席亲自起草的那篇谈话。为了使真理的声音传播更广，小徐播完一遍后，小姚又再播一遍。在整个广播过程中，她们几乎拼出了全身的力量，使每一个字音都深深地印入听众的心里。她们播出了对国民党亲日派的严重警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那种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的语调，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冬天夜晚的窑洞是寒冷的，可是这两位姑娘在播音机前竟汗流满面。当她们从窑洞里走出来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的感情从她们的脸上流露出来。是啊，这正是另一条战线上的胜利啊！

完成这次播音之后，我们更深深感到，自己是战斗在一个光荣而重要的岗位上。各个根据地，经常以各种方式，把收听的效果告诉我们，从各方面鼓舞着我们。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事：一天，突然接到从国民党统治区邮来的一封信，署名是昆明学联。信上说，昆明的进步青年常常偷听延安的广播。从广播中，他们知道了敌后根据地的军民许多英勇斗争的事迹，知道了边区人民正过着丰衣足食的生

活，知道了延安正在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一切都使他们加深了对共产党、对革命的了解，产生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特别使他们感动的是，我们红色广播电台播送了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真实情形，而这是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所绝对做不到的。这封热情洋溢的远方来信，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正如电台工作人员在自编的“延安广播电台进行曲”里所唱的：“我们要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照射四方……”是的，我们电台的几十个同志，包括日日夜夜警卫着电台的战士们，都为着这个目的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

我们的红色广播电台的播音工作继续着，后来虽然因器材设备供应困难，曾经暂时停播，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播音，但初创时期的这段工作，却为后来的正常播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每当我回忆起这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工作的情景，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我，要我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努力不懈地从事新的战斗。



在延安和陕北 新华广播电台的日子里

温济泽

一

1943年1月，在延安，我从中央研究院调到解放日报社。这是我做新闻工作的开始。

解放日报社在延安有名的清凉山上。清凉山靠近延安城，在城外东北角，中间隔着延河。在这座山头上还有新华社。我一到清凉山，就听说新华社每天发文字广播，还有口头广播，口头广播的电台叫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延安台是在1940年底建成的。当时延安受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电台的发射电力只有二百多瓦。发动机是用一个旧汽车头改装的。燃料是用烧木炭产生的煤气。电压很不稳定，广播出去的声音忽高忽低，常常听不清楚。我到清凉山不久，就听说因为播出效果不好，一时很难改进，加上发射机发生故障，只好暂停广播了。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延安军民万众欢腾。这天晚上，我们正在紧张地工作，忽听得远处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从清凉山上向城南新市场一带眺望，在欢声雷动的海洋中，高举火炬游行的人们，像是几条火龙在飞舞。听采访回来的同志说，有些人是把自己的破旧棉衣浸上油当火把用的。还有些商贩把零售的小食品分送给游行的人们，也不要钱。延安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新华社的同志把惟一的一台收音机，安上广播喇叭，摆在窗台上。很多人都跑到窗前的山坡上听广播。这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改变了日常的广播节目，反反复复地广播以蒋中正名义发表的所谓“命令”，让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地待命”，而叫伪军去受降并维持治安。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要下山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了。大家听了非常气愤。

我跑去找博古同志。他当时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又是新华社社长。我告诉他刚才听到的广播。他说，党中央已经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在准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又说，在这个时候，急需把我们自己的口头广播恢复起来。原来那部发生故障的发射机早已修好了，已经用于文字广播。

口头广播试播的那天晚上，我们聚集在山坡上收听。后来，从敌后各根据地和从重庆等地发来的电报中，知道他们听到的声音是清楚的。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在9月5日重新正式恢复了广播。这一天，是延安军民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的日子。广播报道了庆祝大会的消息，宣传了全国军民特别是各抗日根据地



军民艰苦抗战八年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并且表达了延安及各根据地军民为保卫胜利果实和建立新中国而继续奋斗的坚定立场和坚强决心。我国人民广播史上的一场新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广播的时候，我仍在解放日报社工作，主编副刊。我们非常重视延安台。《解放日报》及时报道了延安台恢复广播的消息，副刊连续发表了几篇介绍延安台的文章，还陆续选登过延安台播出的几十篇专稿。

二

1946年6月，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进行了大改组。这是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抗战期间，党中央直接领导和掌握着两个新闻宣传工具，一个是《解放日报》，一个是新华社广播，包括文字广播和口头广播。在长时间内，对这两个工具，是以《解放日报》为主，重要的消息、文告、社论和文章等，都是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然后，新华社选择和摘编报纸上的东西，进行广播。这时候，正是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这种新的形势要求把重要的消息、文告、社论和文章等，及时地先由新华社播发到全国，同时发给《解放日报》。因此，新华社的机构需要扩大，而解放日报社的机构可以相应缩小。当时，新华社成立了几个编辑部，其中之一就是语言广播部，我们习惯地叫它口头广播部，也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编辑部。我调到语言广播部任主任，开始兼《解放日报》副刊部的工作，后来杨思仲（陈涌）同志接替了我在副刊部的职务，我才专门做口头广播工作。

《解放日报》编辑部原来占用在半山腰的两排十孔石窑洞，改组后，作了调整，新华社几个编辑部也都搬到这里办公。由于窑洞比较少，语言广播部就 and 副刊部挤在一个窑洞里。

随着新华社的改组，原来由军委三局管理的广播电台的发射台和播音室，机务人员和播音人员，也划归新华社统一管理。新华社成立了电务处，统一管理文字和口头广播的机务工作。因为播音室跟机房在一起，播音员都列入了电务处的编制，但业务上播音工作由编辑部领导。原来播音室在西北郊裴庄，发射台在盐店子，离清凉山有二十多华里。这时都搬到离清凉山不远的文化沟。以后，又搬到更近一些的北关。当时美军观察组住在北关，用电的条件比较好。这一来，我们就更方便了。

延安台在1940年到1943年播音期间，最早的播音员是姚雯和徐瑞璋，以后是肖岩。1945年重新恢复广播的时候，开始是慕琳。以后她病了，先后调来了孟启予、丁一岚。到了1946年春天，又调来了钱家楣。播音员的队伍也加强了。机务组有毛动之（组长）、刘振中、刘志远、李志海、武慕华等，他们都是既负责文字发报，又负责口头广播的机务工作。

三

开始时，延安台每天播音两小时，分两次：一次在中午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一次在下午6点到7点。节目有：新闻、通讯、评论、解放区介绍、解放区政策讲话、故事、